

评建国四十年来的图书馆学教育

彭斐章 谢灼华

图书馆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在于通过政治、文化、专业知识的训练与培养,造就一大批合格、适用的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人才和专业干部,服务于图书馆,发展图书馆、推动图书馆事业。我国正式的图书馆学教育,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30年代,少数的图书馆专门校、系,比较多量的图书馆员业余教育,大量的短期培训、职业教育,加上个别的国外学习与研究,构成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层次,即学校教育不发达,为数不多的毕业生满足不了图书馆界的需要,专业进修与培养,知识系统性不够,培养层次不高,也就是说,是不完善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这种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我国解放后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学教育已有四十年了,图书馆学教育从性质和教育内容都产生了质的变化。作为图书馆学教育,是属于新中国文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成绩是显著的,社会效果也是很大的。但是,四十年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经验和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本文旨在从发展全貌、规模、布局、管理的宏观上和教育体系、内容、方法和人才成长等主要问题上评述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因此,可能比较少的从数量上说明问题,而着重于从观念、认识和思考上讨论。我们相信,这种探讨可能是有益的。

(一)

解放初期,我国高等图书馆学教育单位,主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解放初社会教育学院停办)。1951年时,国内有北大图专、文华图专和西南师院图博科三个教育单位。1952年,院系调整时,文华图专由中央文化部接办,并入武汉大学设图书馆学专修科。1954年,西南师院图博科撤销。我们把从1949年至1955年期内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个阶段——解放初期的图书馆学教育,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内,图书馆学教育主要成绩是:一、加强了人民政府对图书馆学教育的领导,通过贯彻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派出党的干部领导教育单位,补充了新的师资队伍等,促进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正常化;二、初期从事了教育内容的改革,补充了关于苏联图书馆学的材料,特别增设政治理论课程,有利于教师、学生思想觉悟的提高;三、扩招或兼收学生,适应了解放初期图书馆工作急需专业干部的需要,这些毕业学生成为我国图书馆界的重要力量。

回顾解放初期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两点教训是可以吸取的:一、宏观上考虑图

图书馆学教育的布局,应保留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的建制,或并入如南京大学或江苏师范学院,使之成为华东地区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基地,同时扶植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这样,全国东、西、南、北四大部分都有专业办学单位。二、图书馆事业主管部门和有关学校兼顾图书馆专业教育的发展、关心图书馆学教育改革不够,校际交流亦较差。所以,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学内容改革偏少,政治教育和社会斗争实践较多。学习苏联是必要的,但真正吸取苏联图书馆学成就补充教学内容成绩并不显著。而对英美图书馆学内容与中国现实情况结合不多,出现内容安排不合理、课程单一的局面。

解放初期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薄弱和教学内容上的不足,直接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水平。

(二)

1956年,全国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图书馆事业得到社会的重视与支持,中央文化部为适应文化事业发展,加强图书馆事业的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特别强调培养与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与水平。据此,提出除办好北大和武大两个图书馆学专修科外,1958年成立文化学院。与此同时,教育部把图书馆学教育列入议事日程,分别将北大、武大两单位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本科四年制,相应提出了办学目标、要求和教学计划的修订。1958年,“大跃进”中的图书馆事业影响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图书馆学教育在教学体系、内容和方法上受到冲击。认真思考从1956年至1960年期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1956年,适应从图书馆学专科升为图书馆学本科,北大武大两个图书馆学系加强了交流与协作。从1956年开始执行的本科四年制教学计划,比之解放初期的教学计划应该说是有所进步的。其主要思想是加强图书馆技术与方法的教学,与之相联系的教材、教学方式,也是有所提高的。但是,增加文化课程份量过重,削弱了专业学习,没有比较及时地反映50年代世界图书情报教育的趋势并采取相应措施,对图书情报理论研究没下力量进行组织和支持,这些弱点终究导致了专业教育体系的不完善、教学内容的不充实。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与当时师资队伍素质不高和数量严重不足是有关系的。当然和领导者指导思想有关,即实现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培养和输送人才的目标。如何从思想、知识、技能教育等各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明确的,而条件准备也是不足的。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薄弱,必然导致图书馆学教育理论研究的不足,这是要引以为教训的。

1958年,“大跃进”的局面波及图书馆学教育领域,教育战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打擂台、群众编教材、青年占领课堂,这种种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不仅严重挫伤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而且违背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破坏了教学的正常秩序,其主要结果是,教学体系和内容被打乱了,按图书馆类型设立课程,实际效果是批判旧的重复又走上了新的重复;强调干中学习,通过具体任务完成教学内容,往往学生掌握的知识都是零碎的,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知识体系。强调理论提高和系统化,往往把政策条文、工作做法和经验作为教学内容,冲淡以至削弱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当然,这种条件下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方法也是混乱的。过多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也转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当时学生冲击旧的教学秩序,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教学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而这点上是违背的。粗暴的批评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过火

的行为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所以，学生的良好愿望落空了，教师的努力也无法实现。

(三)

经过“大跃进”以后，我国进入调整巩固阶段。这种调整不仅是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与巩固，而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调整。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调整和巩固，具体体现在如“高教六十条”等条例的颁布与贯彻。此后，我国各项事业在调整中巩固和充实，进而各项工作得到了提高与加强，图书馆事业得到了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在贯彻“高教六十条”中，在专业调整、内部整顿、深入教改、提高质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1. 专业调整。当时，北大、武大图书馆学专业继续发展，前一时先后成立的东北师大图专、文化学院、河北文化学院相继停办，教师和教学设备、图书相应并入有关部门。

2. 深入教育改革。1961年开始，全国图书馆学专业采取协作形式分别编写了《图书馆学引论》、《图书馆藏书与目录》、《读者工作》、《目录学》、《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等教材，这批教材虽未正式出版，但在贯彻文科教材编写会议的指导思想，强调“三基”，尊重专家意见等方面做得较好，成为解放后一批质量较高的教学材料。与此相辅而行还编印教学参考资料，满足了教学需要。由于科学研究的开展，对图书馆学、目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充实了教学内容，逐步完善了教学方案。

3. 内部整顿提高。图书馆学教育方面贯彻“高教六十条”的主要成绩，就是强调学生以学为主，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密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与造就又红又专的专门人才。在这一段时间内，各校调整了教学方案，加强了教学质量的检查，完善了教学管理制度，并在改正1958年遗留问题上尊重教师，尊重人才，贯彻双百方针。可以说，图书馆学教育已经走上正常化。

综观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至1965年时，从高等图书馆学专业的整顿和发展看，成绩是主要的。从人才培养质量上看，如毕业生思想觉悟较高，业务知识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工作技能和方法比较扎实，服务思想和态度端正等，都是可以肯定的。与此同时，成长了一批热爱图书馆学教育，教学和科研有扎实基础，思想上积极进取，关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教师队伍。从业余图书馆学教育来看，按系统脱产进修、短期培训和参加函授大学学习提高的人数激增，结合业务实际进修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蔚然成风，这从当时全国性关于图书馆员基本功问题的讨论可以反映出来。业余教育的形式有利于图书馆专业知识的普及，有利于图书馆工作质量的提高。

然而，从1961年进入调整巩固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因为解放以来发展的基础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从总体上仍然存在不同的弱点。

1. 从教育管理上看，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未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这方面从办学点的布局上受部门制约可以反映出来，该办的点受到暂时困难而撤销了。如果当时从宏观上规划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积极扶植部分办学单位，那么，至1966年，全国图书馆学办学点上南北二家的局面就不会出现了。从教育的多层次发展来看，图书馆学的大专、中专处于空白状态，也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大缺陷。从以上几方面看，我们觉得教育职能部门加强图书馆学教育的规划与领导是十分必要的。

2. 从教育体系和内容上看，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和内容，既不能生搬外国的现成方

案,也不能无视世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文化没有自己的积累,没有善于吸取新鲜 的成分,这样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和内容应是有深厚中国文化传统,汲取先进科技发展,适合于中国现实生活,预见世界未来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的体系和内容。过去发展的基本教训就是指导思想上的不明确。1966年前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和内容,正是在强调党性、阶级性中过多强调了政治成分,没有做到善于汲取各种养料和成分,故而有些课程内容是苍白的、图解式的。大胆地摒弃操作式的讲解,更着重从理论上说明是没有达到的。

3. 从教育方式多样化看,专业教育上的多层次、多渠道办学的形式并未形成。图书馆学教育是一种专门的教育,同时又具有综合性教育的特点,这不仅是知识基础的教育,而且还有专门研究的教育。作为高层次教育,未给予重视,就是业余教育的发展,也是短期行为较多,这对于学科交叉知识较多、新技术应用较广的图书馆专业教育是不解决问题的。因此,到1966年为止,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层次不多,短期培训作为图书馆工作者的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曾经起过一定作用,取得了一定效果,仍然存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推动力不够的缺点。因而,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因人才缺乏,特别是高层次人才过少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四)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使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走上了停滞不前的进程。仅有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停止招生,相继停课,教学秩序全部被打乱,教师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而受到批判、斗争,部分毕业生被分配到各行各业、不考虑学以致用用的原则。1969年,专业教师下放到工厂、农村、部队搞斗批改,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教师的业务耽误了,教师队伍受到摧残,教学设备、图书资料遭到严重破坏和散失,图书馆学专业处于停顿状态。

1972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停顿六年之后恢复招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当时,在办学体制上试行了改革,北京大学采取了“馆办专业”的体制,武汉大学是采取由“系办馆”的体制办学的,这两种体制办学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端,为师生接触实际创造条件。但是,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的干扰,强调以“大批判”开路,工农兵上讲台,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所以课堂教学被冲击,教学计划和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方法上违反教学规律,采用能者为师,以干代学,完全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不适当地缩短学制,加之学生起点低,学习时间得不到保证,学习内容完全不讲究系统性,更谈不上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文化大革命”对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建国以来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出现“滑坡”。

(五)

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清理了“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1977年恢复“文革”前实行的统一考试、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高等学校招生办

法。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参加图书资料组的代表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图书馆,代表们认真讨论了如何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作贡献的问题,并且制定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和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方案。1983年4月教育部在武汉大学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座谈会,会议认真研究了图书情报专门人才的需求状况、知识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等问题,与此同时,还就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教学方案、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的建设等进行了讨论,会议不仅总结了我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教学经验和教训,而且提出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应当建立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多种规格、布局合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体系的目标。1985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教育工作的改革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

1. 专业办学点增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

图书馆学教育在我国虽然已经六十九年,但是,解放前的图书馆学教育是不被重视的,从专业教育发展规模看,建国四十年来的图书馆学教育前三十年基本上是重视不够,不适应图书馆事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1978年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迅速发展,专业办学点的建立,犹如“雨后春笋”,各个大区以及大部分省市相继建立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单位,布局逐步趋向合理,招生规模扩大,为图书馆战线输送了大批合格的专业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需要。

2. 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办学体系正在形成,成人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近年来图书馆学教育改变了体制单一,搞“一揽子教育”的弊端,实行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办学体制,有稳定的硕士生教育,有本科、专科和中专,还有适应专业图书情报单位需要的旨在培养专业图书情报人员的教育单位。图书馆学成人教育取得了可喜成绩,为适应图书情报单位在职人员业务素质提高的需要,除了坚持图书馆学函授教育以外,近年来采用广播、电视等手段进行远距离教学,突破了传统的学校面授的空间限制,方式灵活,扩大了办学规模,部分地区实行了高等图书馆学自学考试制度。此外,还有专业证书班,各种专业短期培训班、研究班、进修班等各种办学形式。

办学层次的多样化,不仅改变了图书馆学教学体制单一的缺点,有利于多种形式培养人才,为各种图书馆工作需要输送干部,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和水平,而且这种办学方式,有利于改变图书馆干部队伍素质,组成图书馆学研究的梯队,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并为根本改变图书馆学研究比较薄弱的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积极进行教材建设和科学研究,促进了图书情报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以后,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根据文科教材建设指示精神,采取协作形式,编写了《图书馆学引论》、《藏书与目录》、《目录学》、《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和《读者工作》等专业基础课教材,这些教材虽未正式出版,但对保证教学质量,解决教学需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图书情报学教育有计划地进行教材建设是从1978年开始的,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1978—1983年)的有8种,列入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年)的有近五十种,近十年出版了《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概论》、《中文工具书使用法》(以上三书均获国家教委1988年优秀教材一等奖)、《科技文献检索》(获国家教委1988年优秀教材二等奖)。此外,还出版了《图书馆古籍编目》、《情报学

概论》、《情报检索语言》、《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图书馆目录》、《图书馆学导论》、《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社会科学文献学》、《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文学目录学》、《目录学普通教程》、《图书发行学概论》、《情报数据库系统》,以及适应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用的系列教材。这些不同层次的教材的编选和出版,注意总结图书情报工作实践经验,吸取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在教材内容和体系结构上有所创新,不仅改变着专业教材缺门少类和内容贫乏的局面,同时,对解决教学急需,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4. 教师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教师成分有所改变,教师素质不断提高。

建国以来,我们图书馆学教师队伍,一部分是解放前培养出来的老专家,其中有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也有的是其他学科毕业后转入图书馆学教学的,他们为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学术成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另外一大部分是解放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培养出来的。近十年来,由于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一大批在图书馆或情报部门经过长期实际锻炼转到教学单位,还有的是其他学科毕业后再进修图书馆学,进入教学岗位的,加上到各国进修图书馆学情报学归国的各类学者和青年专家,这种情况有利于图书馆学教师单一成分的改变,有利于改变整个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为优化教师队伍打下了基础。

(六)

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主要形式是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学系、科或专业,担负着为图书馆、情报单位、文献信息交流部门输送合格专业人才,以及为图书馆学、情报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准备后备力量,因此,它既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我国图书情报学院、系、专业大多设在综合大学,这是由于综合大学具有学科门类齐全,文理科公共基础课程师资素质较高,校图书馆规模大、藏书丰富的特点,很适合图书情报教学内容涉及面广,要求学科知识面宽的需要。当前,信息量急剧增长,知识不断更新,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图书情报教育也面临挑战,因此,高等图书情报学教育单位重新考虑了教育体系、教育内容、课程设置,体现了图书情报教育综合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拓宽专业口径,扩大知识面,培养学生探索新知识和提高就业和转移工作领域的适应能力。应当看到近十年来在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图书情报学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特别是在图书情报教学综合化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有待于教育领导部门和全体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加以克服。首先,应稳定办学规模,调整办学单位。图书馆学教育与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建设的需要还不相适应,专业办学点布局不尽合理,某些地区同一层次的办学点过分集中,不利于按照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分级培养人才,有的办学点不安于按照社会需要的层次办出自己的特色和水平,而是不顾国家的需要和办学效益,盲目扩大规模,片面追求高层次,造成专科和中专层次缺乏。对新的办学点的审批缺乏宏观控制,对其办学条件、专业教师水平,没有依靠专家进行认真的论证,致使一些办学点专业教师数量不足,水平又低,办学条件差,匆促上马,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亟待采取措施,予以调整。其次,抓好业务培训,提高成人教育质量。成人教育发展迅速,

(下转95页)

关于俸料，唐朝是用铜钱，即开元通宝钱来计算，日本的计算则是用绳、绵、布和釜等实物。釜是一种农具的名称，这是因为日本当时的货币经济还不发达。虽然日本已模仿唐“开元通宝”钱，铸造了“和同开珍”钱，由于市场有限，使用流传不广，因而给俸料不用钱。

关于资荫制度，唐朝的荫子出身阶仅限于正七品上到从八品下。日本的资荫的人数多，如荫子出身阶、嫡子出身阶自从五位下至从八位下；庶子出身阶也是正六位上至从八位下，说明日本贵族高位者的特权比较大，世袭制度的影响还较强，而唐朝大部分官僚不是靠资荫，而是靠科举制度考试取得。日本当时虽然也模仿唐朝考试学生，但还没有建立唐代那样开科取士的科举制。

古代日本社会的发展状况，比之中国的隋唐社会有些不同，日本比较后进，固然努力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度来制定编纂自己的律令，乍一看好象类似的地方比较多，可是在各个具体方面也有为适合日本社会情况而作的改变、修订。因此可以这样认识：古代日本的法律制度是在学习唐朝律令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上接115页）

为在职图书情报工作者的业务素质的提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如何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教学，迅速改变本科生、专科生同念一本经的状况，编写适合成人自学为主的特点的系列专业教材，宏观上有效地监督和控制成人教育的质量等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三，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专业教材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关键在于不断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水平，以新的研究成果充实教材内容，处理好各门教材之间的交叉和重复，为了加强与扩大国际间图书馆学的交流与合作，博采各国之长，应当引进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材，以资借鉴。第四，加强领导与监督，对图书馆学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建立监督、检查和评估制度。应该在有关教育部门的领导下，讨论制定统一的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提倡统一方案下根据不同专业特色选用教材，组织教学。同时，定期组织本专业基本课程统一考试，进行各办学单位教学质量评估，以利于专业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